



乡村遗产是传承与创新相互促进的社会成果。近年来，人们不仅关注历史村落与文化景观、文物与乡土建筑、文献与民俗技艺，更将目光投向乡村博物馆、乡村公园、当地特色传统产品开发和品牌建设等。

## 乡村遗产中的“村超村晚”

朱玉芳

声音，穿着自家人用双手制作的衣服长大。‘倚山人’即倚山而居的人，想表达的是侗族人与大自然一直和谐共处、相互依存。”杨成兰说。

2016年，杨成兰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开始创业做侗布。刚起步时，工作室只有20平方米大小。她挨家挨户找织娘，坚持手作侗族土布。现在，她的合作伙伴有300多人，遍布周边十几个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天才妈妈”项目也在此落户，通过带动精通侗族织染手工艺的妇女就地就业，不必再外出打工，从而减少了留守儿童现象。

创业8年，杨成兰在乡间地头建起了集染坊、手作房、织布间、体验空间、文创展厅于一体的工作室；不仅做植物染、手工织布、文创产品，还发展起了非遗研学、侗寨民宿。产品也远销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2022年，“倚山人”被列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非遗学习中心，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的同时，我们结合现代审美，讲究创新和实用性，希望做出能让更多人使用和喜爱的非遗产品。”杨成兰说。

侗布技艺多以口口相传实现传承。侗布的制作工序繁多，包括纺纱、织布、染布等，每道工序都极费时间与精力。在当代，侗布制作工艺同样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这么多年来，总担心这个手艺失传。”杨成兰描述工作室背后的故事，“我们不断去吸引、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了解当地文化，感受其中的魅力。”

“与刚创业那几年比，现在工作室的年轻人多了一些。”杨成兰说，“这一年来，‘村超’火爆出圈，也让我们这里的客人多了起来，更多人前来关注和了解这里的非遗。我盼望这样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努力去做，也希望我们的侗族土布走向世界。”

### 关注新的文化现象

“‘村超’让更多人知道榕江，也让榕江的民族特色、非遗文化更加出名。”榕江县月亮故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文创负责人罗芸说。在榕江县“青于蓝蓝染艺术中心”和“月亮故乡文创中心”，特色蓝染总能吸引前来观光的游客。在“村超”赛场周边的非遗展销区，许多产品也出自这里。

2018年，位于榕江县城古州老街的两湖会馆，成为“榕江县月亮故乡文创中心”，展示服装、家具、首饰、文具等民族艺术系列文创产品。2023年夏季开始，公司推出了“村超”系列的T恤、足球抱枕、车载香囊、丝巾、胸针、首饰、包袋、装饰画等一系列蓝染、蜡染产品，仅2个月的销售额就达到40万元人民币。

“那时我们要马不停蹄地加班生产。”罗芸介绍。平时车间里只有十几个绣娘，而在“村超”最火的时候，每天都需要40多个绣娘，最高峰时竟有95个绣娘同时在车间忙碌。

这些心灵手巧的绣娘大多来自榕江县周边各个村寨。设计师刘洋是“月亮故乡”的创始人。从2018年起，刘洋发起了公益项目“让母亲回家——手艺点亮回家之路”，公司把车间也搬到了当地扶贫搬迁小区，便于绣娘就近工作，有些活计还可以带回家里做，从而带动村寨妇女就业。“忙碌的时候，绣娘每月的计件报酬能到三四千元。”罗芸说。

“村超”也为两湖会馆带来了新客流量。这里是“月亮故乡”蓝染研学主题线路的地点之一。“村超村晚”举办的当天，在会馆举办了春节前最后一期研学营的开幕仪式和蓝染体验课。罗芸明显感到，在“村超”和新媒体传播的带动下，返乡的年轻人变多了。新招募的许多研学非遗讲师，都是返乡的年轻人；“村超”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蓝染文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融合机会。”

“村超”“村晚”为乡村遗产带来的衍生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各地新出现的文创产品、文化品牌，为历史文化名城、名村镇和非遗保护创造了更多的“历史”机会，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进入可持续良性发展轨道的大小“村超”“村晚”，不仅可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更可能逐步进入乡村遗产的大家庭，成为其中的活态构成。

▲贵州“村超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将“村超村晚”与少数民族特色节庆相结合，在呈现“村超”贺岁赛事的基础上，围绕传统特色村落展示、民族文化传承、旅游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四大要素，开展系列活动。图为村民组成的表演队身着民族服饰进入活动现场。

►足球运动在贵州省榕江县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图为“村超村晚”活动中的榕江青少年足球表演赛。



保护区，被誉为“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榕江县民族节日众多，民俗活动丰富多元，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29个中国传统村落，每年的民族民间节日多达25个。

榕江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优势创新融合到了“村超”中。在球队入场和比赛间隙，侗族大歌、芦笙、摆木鼓舞、多耶舞和少儿体操轮番上阵，加油助威。表演者来自不同村寨，身着多彩华丽的民族盛装组成啦啦队环球穿行，成为球场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尤其是当侗族大歌回荡在球场上空时，现场的人们都被那传唱千年的歌声感动到了。

### 侗寨增添新活力

“村超”的吸引力，已辐射到球场之外。从榕江县城出发，在山间向东北方向行25公里，就可以抵达栽麻镇的大利侗寨。2006年12月，大利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同时，它也是“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全国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一路盘桓上山。绕过高大茂盛的古树林，这座典型的侗族村落逐渐出现在眼前。冬雨刚刚来过，树枝上垂挂着冰霜；溪水穿寨，夹映着两岸的风雨桥、鼓楼和吊脚楼。村民们围坐在鼓楼的篝火边，身着盛装，唱起侗歌。

春节前夕，寨中各处已贴上春联，挂好了红灯笼；风雨桥上，侗族姑娘编织着花带，各式民族手工艺品围绕在身边。穿过风雨桥，沿石板路来到寨子高处，这里是侗寨标志性建筑九重密檐式六角攒尖顶鼓楼。鼓楼是侗寨的象征，也是集会议事的公共场所。逢侗族新年等节日，全寨人都要相聚在这里，至今习俗仍存。

侗寨大多隐于深山幽谷间。“大利”之名来源于古老的侗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利侗”，自明初建寨，大利侗寨的历史已延续600余年。

2024年春节假期，这个原本偏远的民族山寨也迎来了客流高峰，许多游客其实就是球友。“村超”和“村超村晚”也期望为分布在周边的历史村落、村寨中的“非遗”引入新活力。为此，榕江推出“超好游”路线，制作和发布各类打卡旅游攻略，在“村超”举办期间，还有340.62万人次的游客被“带动”“引流”到周边县市。

### 年轻人回乡创业

距离大利侗寨不远就是丰登侗寨。为庆祝龙年春节，侗寨村民唱大歌、唱侗戏，打糍粑、做豆腐；长辈们还会拿出平日里一遍遍晒好的侗布，给家里的小孩做过年穿的新侗衣。进入丰登，到处可以看到“倚山人”的品样标识，这里的山水田园间坐落着“倚山人”的手造工作室，主理人杨成兰是从这个村寨里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也是第一个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我从小上山采植物染布，听着家家户户的织布机

### 新的节日受青睐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全年有390余个民族节日，其中万人以上的节日有120多个。2024年龙年来到之际，这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节日：“村超村晚”。

今年2月3日，2024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暨贵州“村超村晚”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举行，以此拉开了喜迎新年的序幕。

“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2023年初，文化和旅游部下发文件，鼓励各地开展“四季村晚”活动。

2023年，榕江以“村超”名气大增。“村超村晚”也入选了2024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村超村晚”的重头戏，是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职工联队与贵州省村超联队之间进行的2024龙年“村超”足球贺岁战；随后，“舞醉龙”、侗族大歌以及苗族锦鸡舞、摆木鼓舞等节目一起在“村晚”舞台上大放异彩。激烈的体育赛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节日的气氛一直到深夜还未消散。人们看完比赛，观摩了表演，又涌到了街上。赛场周边设置了年货大集，挤满了货摊和游客，人声喧嚷，到了晚上则愈发热闹，沿街饭店挑起重帘，各式风味食摊同样“烟火气”爆棚……榕江这座小城，常住人口不到40万，而“村超村晚”当天，至少有3万人来到现场观看。

### 搭建新的交流平台

来到榕江就可以发现，人们似乎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节日场面。据榕江县“村超”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举办“村超”系列赛事以来，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733万人次，仅夏季就接待519余万人次；网上点击浏览量更是达到惊人的580亿次。2024年新赛季，“村超”的参赛队伍覆盖了榕江全县所有乡镇街道，从举办初期的20支迅速增加到62支，总人数超过1800人。从春节前的年后的元宵节，几乎每天都有比赛，再搭配特有的芦笙会、山歌赛等节庆活动，榕江的龙年年味既“浓”又“新”。

进入2月，2024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提出，“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这进一步激发了榕江人的文化激情。榕江县文化馆馆长李莎是“村超村晚”的执行导演，也是“村超村晚”舞台上的演员。“全场2300多名村晚演员来自榕江各个乡镇、各行各业。”她说，“这是村里的晚会，不仅展示民族文化，也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李莎还透露，“村超村晚”组委会正在谋划，在龙年吸引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文化节目走进“村超”。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

### 链接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之一，享有歌舞之州、森林之州、神奇之州、百节之乡、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苗族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核心区、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等诸多美誉。

黔东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侗族大歌”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有国家级非遗56项78处。

黔东南历史遗存厚重，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处，拥有415个中国传统村落、126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摘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网站）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文化产品开发，使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也让乡村文化遺產更好地留存下来、传承下去。

非遗传承人杨成兰（左三）与织娘一起展示手作侗布。

受访者供图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朱玉芳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联合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内外科研单位，对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遗址的石器技术特征开展了系统研究，揭示了欧亚大陆最早的“准备石核技术”。该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 为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上述研究成果被视为泥河湾盆地乃至东亚旧石器研究的重要突破。

据裴树文研究员介绍，作为旧大陆东部古人类演化的重要区域，我国拥有众多的一早一中更新世考古遗址。与旧大陆西部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不同的是，中国早期的石器技术，被认为长期停滞不前，具有相对原始的模式1或者似奥杜威工业的特点。

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说来解释东亚地区的石器技术表现，包括东亚存在一定的生物隔离、文化遗失或人口较少而创新不足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并强调可能存在的技术创新和环境适应因素。因此，中国早、中更新世石器技术的演化特点、模式2（阿舍利工业）的出现时间以及现行早期石器技术研究理念的变革等问题，是学术界长期面临的科学难题。

针对这一科学难题，研究团队选择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开展深入研究。泥河湾盆地位于黄土高原东北部、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发育我国北方第四纪典型的河湖相沉积体系和早更新世泥河湾动物群为学术界广泛关注。

该盆地中的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东部的岑家湾台地发现大量百万年前古人类活动遗址，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岑家湾遗址位于该台地古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古地磁年代距今约110万年。遗址于1984年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谢飞发现并主持4次发掘，2019年裴树文等对遗址进行补充发掘，共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是泥河湾盆地出土遗物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之一。除了石核、石片和修理工具等石制品外，还出土了152个石器拼合组，拼合率高达30%，是世界上拼合率最高的早更新世遗址之一，为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 泥河湾盆地新发现

110万年前古人类石器技术研究获新进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岑家湾遗址发现的准备石核技术相关石制品，其中图中上行为准备石核技术阶段4产品，图中下行为准备石核技术阶段5产品。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 110万年前东亚古人类已具备较高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

通过对岑家湾拼合组的石器技术分析和高精度3D扫描，研究团队系统重建了遗址古人类的剥片技术和工具修理策略。结果表明，岑家湾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其表现形式为生产具有一定标准的最终产品。例如，为生产背面相对平坦的薄片，岑家湾遗址古人类已有能力进行一系列的准备步骤，包括对原料的选择、石核台面和剥片面的预制等。在工具修理技术方面，古人类对薄片片进行有意截断，然后利用其中的一半进一步制作成修尖工具。

除了拼合组所展现出来的进步的石器技术，研究团队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准备石核技术各个剥片阶段的产品，在修理工具中也发现了具有相似修理模式的尖状器和钻器等单个修理工具，为证实岑家湾遗址存在准备石核技术和工具修理模型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岑家湾古人类层级化、标准化和模式化的石器技术，而之前认为的简单的模式1（似奥杜威工业）不同。同时，石器技术特征所展现出来的古人类原料管理能力、长序列剥片能力等，均表明岑家湾遗址古人类已经具备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

据裴树文介绍，准备石核技术最早起源于古人类石器技术演化的模式2（阿舍利技术）阶段，是阿舍利工业体系中的重要技术元素。岑家湾遗址古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同时石核台面和剥片面的准备技术在阿舍利技术的中期才开始出现，如距今100万年前的南非“西维多利亞石核”，也是该技术在非洲的例证。

针对岑家湾遗址的石器技术特征，研究团队认为，岑家湾遗址古人类具备阿舍利人群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但可能因为适应泥河湾盆地石器原料和高纬度生态环境等因素而放弃制作大型阿舍利工具，进而生产小型工具，是对泥河湾盆地燧石原料以及生态资源环境的一种适应策略。

裴树文表示，目前，岑家湾遗址是欧亚大陆最早具有准备石核技术的遗址，表明具有与阿舍利技术相似技术能力的古人类在110万年前就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并发展出了一套与旧大陆西部不同的生存策略和与之适应的技术表现形态，比此前报道的华南距今80万年的模式2技术产品早30万年。

“我们的新结果对中国北方早期广泛存在的小尺寸石制品的研究理念，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的演化与革新，以及东亚地区阿舍利技术的起源与扩散问题等将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该技术在泥河湾盆地发现也对目前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相关技术的争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裴树文说。

上述研究表明，作为非洲之外研究人类演化与技术发展的关键区域，泥河湾盆地在构建东亚百万年人类演化和行为发展模式研究领域具有巨大潜力。日后对盆地内古人类信息的系统研究，将对丰富“东方人类的故乡”科学与文化内涵，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具有重要科学和现实意义。